

Language Contact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Modern History

近代中英语言接触 与文化交涉

司佳 著



上海三联书店

Language Contact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Modern History

近代中英语言接触 与文化交涉

司佳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司佳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10

ISBN 978-7-5426-5736-7

I. ①近… II. ①司… III. ①汉语—语言融合—英语—研究—近代②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研究—近代 IV. ①H1②H31③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5087 号

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

著 者 / 司 佳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290 千字

印 张 / 16.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736-7/H·61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56475597

序 言

在诸多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要素中,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一直贯穿于近代中外关系的实践过程中。从十六世纪起葡萄牙人航海东来直至十八世纪中后期围绕“广州贸易”的中外势力交锋,进而延展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由语言问题而导致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交涉的事例大量存在,并反之进一步影响到本土语言自身的变化与发展。《近代中英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即是近年来挑战国内外以“语言接触”这一跨文史学科相关论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史料建树并具问题新意的佳作。

传统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例如日中交流史研究是以两个国家间形成的国家研究框架为前提。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对语言、思想、民族、宗教、文学、历史等各领域进行个别叙述且积累了一定的成就,但对把握文化交涉的全貌还有所欠缺,对所需要的方法论考察亦没有形成相应体系。这也恰恰反映出现代人文研究的现状,即各学科分支很可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关注同一研究对象,却缺乏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流沟通,可以说失去了研究的整体性。这种倾向还会导致对某些研究问题的忽视。例如,本来是双向或多向进行的文化交流其本质被忽略,尤其在以传统大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对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理解也好似水总是从高处流向低处一样,始终未能脱离“文化从中国向周边国家传播”这样单一方向的理解模式,因而,对文化接触多样性的把握也呈现出单调平板的特征。然而,在“语言接触”或“语言接触史”的研究课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大量存在的恰恰是双向或多向交流的例子。

因此,本世纪伊始,日本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的学者提出“文化交涉学”这一概念,为此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面向。为了确立这个学术体系,我们提倡了一个由“边缘”接近“中心”的研究方法。这里的“边缘”不仅是指地

域的边缘,同时也指学术专业及相邻研究领域中存在的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例如,在我所专攻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历史往往不能作简单分割,因而“语言接触”也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那么由“语言”去接近“历史”,还是通过历史来解剖诸多语言变化的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斟酌把握了。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在相关学术专业中,“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可变通的存在——有时是边缘,有时也可能是中心。

2008年,我所在的日本关西大学成功申请到了日本文部科学省 Global COE 的项目研究计划资助,设立了“东亚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旨在推动培养国际型专业学术人才,并邀请以中、日、英三种学术语言为训练背景的学者开展共同合作研究。本书作者司徒 2006 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7 年学成回国,于她的本科母校复旦大学任教。2010 年至 2011 年,她接受了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学”博士后研究项目的邀请,在我负责的研究室展开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司徒博士这本著作的主体部分便是她在关西大学的这一博士后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期间,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先后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本书的部分章节就是在听取相关领域前辈学者意见后陆续修改而成的。2011 年 6 月她又得到项目资助去美国耶鲁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并收集资料——当然,这不是她第一次去那里寻找关键档案材料了。由于在美国学习的关系,东部几个大学的图书馆以及欧洲部分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她先后去过多次。可以说,在我认识的相关领域青年学者中,坚持求索一手史料并推进语言接触史前沿课题研究的同仁不算太多。当今各国对电子资料的开发与使用都很积极,有的资料或图像完全可以依靠网络检索。不过,在与语言接触史有关的书籍史、阅读史等课题中,史料的原貌仍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方法论的基点;而原始档案所呈现出的全面样态与整体性,一般电子文档也无力替代。2011 年夏天的那一次旅程,司徒博士本已经联系了我我和我的同事沈国威教授一同赴耶鲁大学图书馆,并试图与相关负责人协商《康熙字典》1868 年第一版(中国人编写的第一本英汉字典)的检阅工作,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学校临时内部会议,我和沈教授的行程不得不取消。好在那次资料考察收获颇丰,加强了她书中若干相关篇章的论点。

我们在提出“文化交涉学”这一新的学科研究点以及“边缘”接近“中心”的

研究方法时,重要的思想启发正是来自于原始史料的价值。中国古代有“不识庐山真面目”这样的诗句,我想可以借用定义一种在研究史料上由“边缘”接近“中心”的视界,即从外部材料看待中国语言或文化的本质。在中英(或中西)语言接触史研究课题方面,近代欧美人所留下的西文材料具备其独特的有效性。例如,司佳博士这本著作中所涉及的十九世纪来华传教士、西方人编写字典辞书的相关问题,以及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汉语罗马字拼音化的问题等。在历史上亚洲内部的“文化交涉”范围内,其他各国资料仍需进一步深入重视,如琉球官话资料、朝鲜资料以及满汉、满蒙的资料等。在基于对一手资料的系统整理、分析前提下,语言接触史才能够显现其根本的样貌,并打破传统研究学科视角的隔阂,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方法论的提出。

我相信本书将为文化交涉学打开新的局面和视野,并对司佳今后的研究寄予厚望。谨在此写下数言为序。

内田庆市

2016年7月1日

日本关西大学

CONTENTS

目

录

序言(内田庆市) / 1

导论: 近代历史上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 / 1

一、语言接触: 对象和范围 / 1

二、学术回顾: 边界与延展 / 5

三、研究内容: 文本与人物 / 9

上编 洋泾浜语到双语字典

第一章 语言的纷争: 近代通事与洋泾浜语的历史 / 19

一、中国洋泾浜英语的形成 / 21

二、早期通事与贸易通用语 / 24

三、底层人物群体的作用 / 27

四、十九世纪上海的洋泾浜英语 / 32

五、结语 / 40

第二章 见闻、谈资与讽刺诗: 中国洋泾浜语的域外流传 / 42

一、游记见闻中的洋泾浜语 / 44

二、史料中的通事和洋泾浜语 / 48

三、报刊中的“清国人”英语 / 51

四、讽刺诗与“语言形象”建构 / 55

五、结语 / 60

第三章 汇字与字汇：早期英汉字典里的中国文化 / 62

- 一、双语字典与新词 / 64
- 二、从宗教到文化 / 73
- 三、“汇字”与“字汇” / 78
- 四、结语 / 86

第四章 《五车韵府》的重版与十九世纪上海英语出版业 / 88

- 一、专业性的缺失 / 90
- 二、1865 年的重印本 / 94
- 三、1879 年后的石印版本 / 98
- 四、结语 / 106

第五章 邝其照与中国人编纂英汉词典之始末 / 107

- 一、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字典 / 110
- 二、《字典集成》的文本构成 / 114
- 三、“杂字”的实用价值 / 117
- 四、邝其照的英语学丛书 / 124
- 五、结语 / 130

下编 传教士与中西文化

第六章 近代基督教中文《三字经》与中西语言文化接触 / 135

- 一、三字经体宗教小册的产生 / 138
- 二、麦都思与基督教《三字经》 / 141
- 三、三字经体的功能及影响 / 147
- 四、《三字经》的重印与流传 / 150
- 五、结语 / 157

第七章 《训女三字经》与规训话语之中西碰撞 / 159

- 一、“马典娘娘”其人其事 / 160
- 二、《训女三字经》的文本 / 162

三、女子教育与规训话语 / 165

四、其他“训女”文本 / 168

五、结语 / 171

第八章 传教士缘何研习清代《圣谕广训》 / 173

一、卫三畏家族档案略介 / 174

二、《圣谕广训》的方言手抄稿 / 177

三、研习《圣谕广训》之缘由 / 185

四、结语 / 189

第九章 晁德莅与《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 / 191

一、《中国文化教程》的撰写 / 193

二、翻译策略与文化竞争 / 197

三、晁德莅的拉丁文序言 / 202

四、结语 / 205

附录 /

附录 1 邝其照《英语成语辞典》序言(中译)据 1881 年 A. S. Barnes & Co. 版本 / 207

附录 2 麦都思《三字经》巴达维亚 1823 年 / 211

附录 3 麦都思《三字经》上海 1851 年 / 217

附录 4 《训女三字经》新加坡 1832 年 / 223

附录 5 / 228

参考文献 / 230

一、中文 / 230

二、西文 / 234

三、日文 / 242

后记 / 243

导论： 近代历史上的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

一、语言接触：对象和范围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语言接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任何以不同语言为母语文化背景的人群都会因为殖民、贸易、战争，以及移民、传教等历史事件或环境因素影响而导致语言的接触和交流，由此促动多元文化的交锋、交涉与交融。因而，对这种普遍现象进一步观察或可窥见，语言接触乃是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前提与先导。

“语言接触”对应的英文学术术语是 Language Contact，隶属“接触语言学”的研究范围(Contact Linguistics)，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① 语言接触在国内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提出，当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周振鹤先生与游汝杰先生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第八章：“语言是文化的载负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在今天世界的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外来词就是这种体现”；“分析各种语言中外来词的来源、数量以及进入该语言的年代，有助于理解这种语言所载负的文化曾受益于哪些

① 相关学术史情况，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有关社会语言学与接触语言学研究的英文学术著作：Pier Giglioli,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1972); John Gumperz & Dell Hymes, ed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1964); Dell Hymes, ed., *Pidginization and Creolization of Languages* (1971); John Holm, *Pidgins and Creoles* (1988); Gillian Sankoff, *The Social Life of Language* (1980)。

外来文化,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好恶程度,以及外来文化浪潮的规模。”^①综观近代语言接触的历史,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一定的先导性作用。以十九世纪两次鸦片战争为序幕而开启的晚清“西学东渐”,对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九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中文近代报刊及宗教、世俗杂志,晚清士子与西方人合作翻译出版的西学著述,以及这一时期不断更替涌现的双语字典和新式教科书——作为一手史料,这些作品在当时就已经构成一种新的历史书写。而这些著述中的遣词造句,更是隐含了中外文化交流与交涉的痕迹: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使近代国人对西方诸多外来概念(物质与非物质)的阐释成为一种复杂的思想与释义交流;中国传统思想、学科、语言,以及整体知识体系也由此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经历了巨变与转型。因此,系统地研究近代中西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涉的历史,可以为交叉学科的研究开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宽阔领域,亦是传统中西交通史研究脉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在现代欧美学术研究领域,“语言接触”一般划归为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下属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因文化接触而发生的语词借用、洋泾浜(Pidgin),以及混合语(Creole)等语言现象。已有代表性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讨由“语言接触”形成的“历史推动力”(historical forces),并对历史上发生的诸多区域、社会不平衡等问题作出分析,认为“语言接触始终就是由不平衡的社会力量所导致的历史性结果”。^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多奉此语为圭臬。在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这一主流观点主要是指共时环境下(尽管乃历史上发生)由于社会阶层不平衡而导致的“语言接触”现象,例如研究低语域与高语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交流模式与变化形态。这些前人思想对涉足于近代中西语言接触史研究的学者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然而,如若将此论断置于历时环境或历史语境下,以欧美为主导的学术话语框架就明显存在一个问题——在这种主客体的陈述关系中,“语言接触”随即成为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扩张等一系列“不平等”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37页。

② 此观点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语言学家吉莲·桑可芙(Gillian Sankoff)为代表,她是最早推动“接触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家之一,国际上研究洋泾浜语、混合语的权威学者。见 Gillian Sankoff, “Linguistic Outcomes of Language Contact,” in Peter Trudgill, J. Chambers & N. Schilling-Estes, eds.,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pp. 638-668.

历史推动力作用下的一种文化史结果。但在历史学家看来,研究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史进程中的“语言接触”课题,其任务或不满足于探寻“语言化石”之表象,而是要将问题产生的源起、动机、进展、目的等等,一并发掘。

在全球史视角兴起后的各种新兴史学理论引导下,欧美学术框架内的语言接触研究亦逐渐成为跨地区、跨文化的一种表达,所涉及的诸多实质性问题与后殖民理论思潮中的语言象征及身份认同相关。受惠于社会学语言理论,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就曾经评价说,“语言学、社会学(包括社会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的一项学科交叉空白,可以也应当由‘语言的社会史’这一研究课题填补。”^①由于近代欧洲殖民主义而导致的西方价值观念与文化势力的扩张,对历史上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其语言、文化、社会、制度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种“历史推动力”的导引下,文化塑造或“形塑”(cultural shaping)力量亦进而渗透到“语言接触”层面,对语法变化、语词借用、新词产生,以及“语言形象”的建构等诸多文化语言学问题皆有助力作用。此前欧美学者有关“语言接触”的研究,如前所言,多关注的即是近代历史上曾经遭受过西方殖民统治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区域的本土文化大多缺乏历史根基,因而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改造,尤其是来自强势文明的影响。

与此不同,十八世纪末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贸易势力在向远东地区大规模扩展时,面临的是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有学者曾经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后的这一世纪之交称作“龙与狮对望的世界”——实乃恰当不过。^②然而,近代中外语言接触的交锋形势在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后发生了急剧性逆转。1844年代表美国政府与清廷官员进行条约谈判的外交官顾盛(Caleb Cushing)于是年6月发表题为《中国和欧洲政府之间》的评论文章,论述了时局之下的语言交流与文化交涉情状。“局势的进程给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异样的便利条件。之前,政府对所有的接触途径都设置了障碍:禁止向外国人出售中文书籍,惩罚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中国人。但是现在,英国人的武力改变了所有的一切。倘若以前就有这样的优势条件,能使外国人接触到中国

①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nguage*, pp. 1-3.

② 黄一农《龙与狮对望的世界: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出版物为例》,《故宫学术季刊》,2003年第2期,第265—297页。

上层的知识阶层,学习汉语就会同学习一门欧洲语言一样便利。”^①我们无法得知作为外交官的顾盛如果真正获此途径学习汉语,其个人经历与感受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当时美国外交官(包括顾盛本人)与清政府的谈判,大多依赖传教士的帮助,此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②不过,作为政府利益的谈判人,欧美外交官们对于扫除语言障碍,获得正当的语言学习途径,进而主动掌握政治、文化话语权这一要求是清晰而直接的。签订于1844年1月的《中美望厦条约》以及1844年2月的《中法黄埔条约》中,都有针对先前清廷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接触中文书籍等问题列出的专门条款,以保障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学习语言的自由:“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语音,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佛兰西人在五口地方,听其任便雇买办、通事、书记、工匠、水手、工人,亦可以延请士民人等教习中国语音,缮写中国文字,与各方土语,又可以请人帮办笔墨,作文学、文艺等功课。各等工价、束修,或自行商议,或领事官代为酌量。佛兰西人亦可以教习中国人愿学本国及外国语者,亦可以发卖佛兰西书籍,及采买中国各样书籍。”^③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经历了多次中外条约签订并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然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文化主体地位却未曾动摇。十九世纪以来华外国人虽对中华帝国的历史、风俗多有诸如“静止”、“后退”等贬损之词,但其笔下所记之中国文化总体上依旧保持着较为强势的面貌。因而,由于观察角度不一,西方话语主导的叙事者所界定的“历史推动力”并不能简单作用于中西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再者,受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文化史以及新文化史理论思潮的影响,历史学家更倾向于重新审视“语言接触”的多元文化面向,并质疑此处划定“历史推动力”的界限仍较为模糊,且很可能会忽略一些特定的语言接触现象在历时阶段的延展及变化。鉴于以上种种,本书的主要工作,不仅试图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因语言接触而导致的一系列“结果”呈现出来,更重要乃挖掘其在历时变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多种因素的之影响,以及由此而链接起来的“历史”。

① Caleb Cushing, “Considerations on the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Governments,” p. 281.

② Frederick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 274.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58—62页。

二、学术回顾：边界与延展

有关“语言接触”的问题，以往多在语言学学科范围内讨论。国内的语言学界于上个世纪即开始关注外来词对本土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且研究颇为全面，以高名凯、刘正琰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为代表。^①然而，要解释新概念、新思想的流行，对典型语词的剖析故可引以为参考，但如果没有线性的穿梭以及面状的覆盖，这个近现代语言学史、思想史上的大问题恐怕不能够被充分表述。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端，当首推意大利学者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所著《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这项研究于1993年先以英语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中国语言学报》上发表，后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于1997年出版了中译本(黄河清译)。^②该书不仅关注汉语新词的产生，亦对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具体问题提出扎实的见解，比如作者对晚清译书机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同时对汉语新词的分类问题予以进一步思考。

差不多同一时期，国内学者也开始在中外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这一研究领域大力推进，并带动了语言学、历史学以及文化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的对话与合作。复旦大学周振鹤、游汝杰两位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对不同文化间的语言接触提出“问题化”的思考主旨。^③周振鹤先生在晚清中—日—欧语言接触、洋泾浜英语、外来语新词，以及过渡词研究等多个方面开创奠基。游汝杰先生则考述了近代中外语言接触过程中，西方传教士对方言著述的贡献。^④作为中外语言接触史上尤为重要的介质，字典辞书的史料价值在以往研究中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周振鹤先生1998年即撰文指出，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扩展，史料的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⑤他认为在涉及中外语言接触史这一专门课题研究时，中外对照辞书、外语教科书，甚至清末坊间粗制滥造的洋泾浜英语课本都是极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近十多年

① 高名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

②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s, Monograph Series, no. 6, 1993);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

③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④ 游汝杰《西洋传教士汉语方言学著作书目考述》。

⑤ 周振鹤《历史研究的深化和史料范围的扩大》，《文汇报》1998年1月9日。

来,受到文化史及新文化史理论思潮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尤其是思想文化史领域的学者大力推进并拓展了这一研究方向。2000年,邹振环先生出版博士论文《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其中有专门一章探讨地理学专门术语进入汉语的过程。^①近年来,周振鹤、邹振环两位先生亦发表了大量与书籍史、出版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论文著作,并指导多名年轻学者及研究生从事并继续开拓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语言接触史的研究工作。

晚清学际,接受外来新词,传播学科术语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使部分读书人的思想与传统观念相脱离。然而,反观这一历史形成过程,研究者往往将新词翻译的过程直接等同于一种思想表达的倾向或主张,称作“话语权”或是“话语空间”,而忽视了译词成型过程中的诸多载体媒介以及交融于其中的社会历史背景。1998年,时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教授的朗密榭(Michael Lackner)及其团队开展了一项名为“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的形成”的课题研究,并在2001年出版了论文集 *New Terms for New Ideas*,即《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中译本2012年)。^②这本论文集集中所收录的近二十篇有关汉语新词的文章出自于1999年在哥廷根大学召开的“近现代汉语学术用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现任教于德国埃尔兰根大学的朗密榭、海德堡大学的顾有信(Joachim Kurtz)和法兰克福大学阿梅龙(Iwo Amelung)三位教授的这项编辑工作,标示了近年来国际汉学研究,尤其是欧洲汉学界,对汉语新词之西学来源的求索动向。按研究主题,论文集大可分为对语言载体本身、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译词竞争的空间、译者个人的作用等几个方面的讨论。编者在序中认为,虽然语言的外部环境,即那些非语言学的因素(non-linguistic factors)在译词表达时作用明显;然而,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剖析仍应作为对其外部的、非语言学因素讨论的前提。因此,在思考外来词、新词在汉语中的受容度这一问题时,语言自身的结构与文化特征乃本质性的决定因素。旧有的语词空间中一旦需要纳入大量代表新思想的新术语,构词法、语法等基本的语言构成要素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基本载体的变化,即决定了在多大的程度上

①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 Lackner, Michael, Iwo Amelung & Joachim Kurtz, et al.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rill, 2001);《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赵兴胜等译。

外来学科、概念能够找到它们的对应与释义，能够在另一个语言体系中表达自身。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由于汉语书面语历史悠久，具有精深的文化内涵，许多实质性的突破并非一蹴而就。因而，大量术语名称的竞争，术语定名的反复，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思想表达的差异。

欧洲以外，日本学界亦较早开始关注有关中日两国的“语言接触”问题。实藤惠秀于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就有“现代汉语与日语词汇的摄取”一章，专门分析了二十世纪初赴日中国留学生回国以后对日译新名词的传播作用。而日本关西大学内田庆市、沈国威，以及东京成城大学的陈力为等教授则特别关注从词汇交流史的角度展开中日—欧语言接触史研究，并借助“新词”在这个时期内的形成过程透视出东西思想的碰撞以及文化互动，并提出“言语接触与文化交涉”这一研究课题。^① 内田庆市、沈国威所在的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还十分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撰集及影印出版工作，比如对《红毛番话》、《遐迩贯珍》、《字典集成》等中西语言接触史上重要资料的研究解题。^② 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史料、语料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因而在图书馆传统收藏中一般不成体系，多零散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研究机构或私人架藏，有些还是珍本、孤本。因此，初入其门的研究者往往会觉得关键资料的检索工作极其费力。在电子研究资料以及数据库建设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始在“近代史数位资料库”的研发项目中加入了“英华字典”一项——这是一个可以检索十九世纪英华字典具体条目的重要数据库，给研究者带来查检原文条目的便利。此外，美国、日本、香港等世界各地的大学及研究机构还发行学术刊物，以推动中外语言接触史研究。比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梅维恒先生(Victor Mair)自1986年起创办的 *Sino-Platonic Papers* (《汉学—柏拉图研究》)，至今仍定期发行，已达261期；日本关西大学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自2000年起主办的《或问》，由沈国威担任主编，至今已发行29期；另外，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定期刊行的《语文建设通讯》和《词库建设通讯》(已停刊)也有颇多

① [日]内田庆市《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沈国威、内田庆市编《近代啓蒙の足跡：東西文化交流と言語接触》；内田庆市《文化交渉学と言語接触》；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沈国威编《近代英华英辞典解题》。

② 详见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网页出版物介绍 <http://www.kansai-u.ac.jp/Tozaiken/publication/publication.html>。

佳作刊登——这些都提供给全世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极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与学科分类问题上,“语言接触”也是一个重要研究环节。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西学”、“新学”传入晚清,催生一系列奠定今日学科思想的词汇术语。作为表达新思想的新术语,其起源、传播和定型过程,本身又是一个探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学科史与各自“身份”使命的问题。在制度变革扮演晚清历史叙事重大角色、西书新学承当变革的源起和工具时,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为传入一方的传教士与接受一方的读书人各自又处于怎样的位置?进一步观察受体及接受者的活动,外来新知又如何引发清末民初地方士子对外部世界的反馈?近年来,在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书籍史、阅读史等相关课题的研究不仅在历史学领域更受重视,在海外汉学史、外语教学史等诸学科中也占据一席之地。国内多个领域学者的著作亦为中外语言接触史提供了多视角的跨学科研究范例,极大丰富了这一研究主题的内容与方法。^①

另外,近几年海外的一些个人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引用。之前关于十九世纪中英语言接触的学术研究,多将英语作为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讨论,而基本上没有关注其跨区域传入本土后的社会反响。然而,近几年关于英语在全球史语境下的研究则显示出殖民地时期英语对于本土文化的转型具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例如,金斯利·博尔顿(Kingsley Bolton)在 *Chinese Englishes* (《中式英语》) 一书中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指出当代香港英语与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 Pidgin English)的历史联系。他用复数形式的“英语”(Englishes)以表现香港地区的英语与历史上其他殖民地英语——比如,亚洲、非洲与加勒比海“地方化的英语变种”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将这些国家及地区不同样式的“英语”置入后殖民研究以及文化遗产的思想语境中。^②在处理华人海外移民与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这一关键问题上,梅·纳依(Mae Ngai)最近发表的文章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由于语言问题,政商、法律界出现了一些新兴职业。比如,对华埠流传的洋泾浜英语

① 比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思想文化史领域的学者以及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在此不一一举出。具体研究状况,详见于各章中的讨论。

②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pp. 1-3.